

烽火中的爱情

王灵仙

1996年清明节，我在古交市睦联坡烈士陵园参观时，被王锡九烈士遗像前一个用彩色绒线精心编织、有锅盖大小的耀眼花环吸引。据陵园负责人介绍，王锡九是在解放古交战斗中牺牲的，这个花环是他当年的新娘、抗战老兵宋立华亲手编织并从成都送来的。我心头一热，询问宋立华的下落，得知她在四川成都后，立刻要了通信地址去信。

很快收到宋立华的回信，她还随信寄来一张与丈夫的合影——照片中她站在摆放丈夫遗像的桌边。信里说，他们结婚8年，只有这张合影。自己快80岁了，不想被宣传。因宋老不愿提供更多情况，这件事只好暂时搁置。

1997年4月，在“古交解放五十周年大型纪念活动”中，我再次来到烈士陵园王锡九烈士的遗像前。不久，许多人围过来，身后传来抽泣声，回头一看，是位满头银丝的老者。我轻拍她的肩膀问：“宋老吗？我是给您写信的小王。”她叫了声“小王记者”，便紧紧抓住我的手哭了出来。

宋立华在古交市住了3天，她对陪同的表弟说，这是她第6次来山西，也是最后一次来看锡九，80岁的人怕是再也来不了了，等自己百年后，要把骨灰在这里撒一些，好与锡九相互照应。我再次被深深感动。

这是发生在三晋大地的真实故事。一对青春年华的战士，战争年代结婚8年，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累计仅2个多月。他们曾约定，等抗战胜利后一起回老家看望双方父母。这不仅是他们夫妻俩的质朴约定，更是战争年代千千万万战士与家人的共同心愿。

故事要从1938年冬说起。19岁的宋立华经当战士的哥哥介绍参加革命，被分配到山西新军野战医院做护理员，当时医院驻扎在吕梁山交城县的一个小山村。不久，哥哥介绍她认识了驻扎在岚岚县21团的王锡九。24岁的王锡九已是排长、中共党员。

1939年，宋立华随野战医院迁到岚岚县

城，两人有了更多见面和了解的机会。一天，王锡九高兴地对她说道：“立华，首长、康主任要见你。”宋立华疑惑地问原因，王锡九解释：“我把咱俩恋爱的事告诉康主任了。”见过首长后，组织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他们把旧军装洗干净，一起吃了顿鸡蛋炒大米饭，就算举行了婚礼。十天后，宋立华调往驻扎在兴县的工卫旅剧社工作，王锡九也奔赴抗日战场，他们的蜜月就这样提前结束了。

战争年代，同为军人的二人聚少离多，常常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或是他往北，她又转战到南。1941年冬天，宋立华趁延安学习结束的机会，赶往界河口部队驻地看望王锡九。一见面，她就嗔怪：“你不关心我，不给我写信。”王锡九并不生气，解释道：“哪里是不关心你。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我既要做思想工作又要指挥作战，现在已是晋教导师。以后我会尽量挤时间给你写信，尤其是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两人再次约定，抗战胜利后一同回老家看望父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们沉浸在幸福与喜悦中，以为团圆和回家的日子近了。这年秋天，夫妻二人兴奋地踏上回忻州老家的路——结婚6年，宋立华还没见过婆婆，王锡九的父母也正急切盼着儿子和从未谋面的儿媳。然而，行至半路，他们被部队紧急召回，随即投入了解放战争。

1946年秋天，部队向绥远方向行军，经过神池县义井镇时，恰好宋立华在这里下乡，夫妻俩得以团聚半天加一个晚上。王锡九送给妻子两个银元：“立华，买点黑细布做个棉袄好过冬。我明天一亮就出发。”第二天早晨，宋立华坚持要送丈夫到大街上，王锡九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部队行军作战艰苦，大家都见不到亲人，你送我上街怕勾起战士们的思亲之情。你好好工作，有机会回老家代表我看看二老，告诉他们我实在回不去。”两人又一次约定，胜利后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

“烽火连三月”的战争年代，他们的每次相会

都伴随着离别，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可谁也没想到，义井的这次话别，竟成了永诀。

1947年春，宋立华遵照丈夫的嘱咐，回原平老家看望从未见过面的公婆。见到漂亮的儿媳，公婆满心欢喜，拉着她的手问个不停。婆婆说：“十几年没见，不知我儿变成啥样了。他走时身体不太好，现在结实了吧？他没空回来，你抽空多回家看看。”公公则说：“春儿（儿子小名）好，先有国后有家。”宋立华握紧老人的手承诺：“等胜利后，我们一定一起回来看望你们。”

1947年6月的一天，宋立华突然收到王锡九所在部队的来信，里面是烈士证和抚恤证，信中写道：王锡九同志在4月6日攻打交城县古交镇水泉寨时壮烈牺牲。顷刻间，她只觉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哭倒在地。

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她强作镇定——她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自己。

她鼓起勇气请了假，第二次回原平见公婆。婆媳俩哭作一团。宋立华向公婆表态，等国家条件好了，一定找到锡九的遗骨好好安置。1972年后，她开始给山西省交城县委写信寻找烈士遗骨，后来得知丈夫牺牲地古交镇水泉寨在1958年已划归新建的古交工矿区管辖，便又一次次地给古交工矿区写信。

从那时起，年过半百的宋立华曾5次只身从四川来到山西，从太原到古交沿路询问村民，联系党史、民政部门。历经曲折艰辛，在古交市委、市政府及当地村干部、老百姓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烈士遗骨的寄埋处，最终将王锡九烈士的遗骨迁至古交市睦联坡烈士陵园。宋老说：“总算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

这就是战士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与海誓山盟，有的是两颗心生生世世、坚贞不渝的相守。他们舍弃了父母、家庭，甚至年轻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战争年代的典范，更是当代人学习的榜样。



曹文进

张千侯将军塑像

位于山西阳泉郊区的华山镇被誉为“将军之乡”，新建的千侯大道通往草帽山，山梁上矗立着抗日名将范子侠将军的骑马塑像，英武潇洒，凝视远方。蓝天白云下的草帽山风景秀美，丘壑吐翠，这里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首战战场。

在讲解员引导下，我们一行人走下大巴。我们瞻仰着范子侠将军立正姿势的塑像，在塑像后方，是他1941年8月15日撰写的《兴奋的回忆（抗日战争）》。我通读全文，心潮澎湃。随后，与郊区文友走进范子侠将军陈列室，望着室内肃立的将军形象，逐一“握手”致敬，聆听英雄事迹。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打响，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侠率部在正太线捣毁日军铁路，切断其运输给养的“血管”。部队袭击阳泉至寿阳段铁路，攻击车站及周边草帽山据点。该车站南依草帽山，日军修筑碉堡和工事，企图钳制八路军破袭行动。

狼峪(测石)火车站是正太铁路二等车站，由日军重兵把守。1940年11月23日，一支“日军”部队抵达，实为范子侠带人化装而成，他们是来“增援”被八路军围困两昼夜的守敌。正当守敌列队相迎时，“援军”突然扫射，全歼日寇，夺取车站。

智取狼峪火车站后，趁周边敌人未反应，范子侠与政委赖发立即下令强攻草帽山碉堡。但日军凭借地势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我军进攻受阻。25日傍晚，我军借夜色潜伏至各碉堡底部，先攻克离车站最近的碉堡。敌人难以招架，竟施放毒气。八路军战士冒死冲锋，最终攻占狼峪，歼灭守敌百余人。范子侠、赖发及多名战士中毒，次日下午脱离危险后，又投入新的战斗。26日午夜，我军再次攻打狼峪据点，激战3小时，摧毁日军7座碉堡，为正太线破袭战扫除障碍。

1941年，范子侠兼任太行六分区司令员，当选边区抗日军人参议员，参加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会当晚，他写下《兴奋的会议》，文中写道：“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在最前哨的岗位上打击敌人……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也是党的儿子，没有别的，永远干下去，永远……”

1942年2月12日，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第2期驻晋日军总进攻”，范子侠在沙河反“扫荡”激战中弹牺牲，年仅34岁，为抗战献出宝贵生命。

环顾狼峪抗战遗址公园，广场上空烈日蓝天。走进展览室，观看纪念专题片，瞻仰百团大战系列展版及战斗沙盘地图，仿佛重回战火纷飞的战场，耳边回荡着范子侠的呐喊：“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当时《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报道战斗经过。刘伯承、邓小平撰写《为范郭两司令复仇》祭文，引起强烈反响。

之后，我们前往阳泉市区狮脑山参观百团

大战纪念馆。该馆建于海拔1160米的主峰，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铁路破袭战核心战场之一。纪念碑如刺刀直插云霄，象征八路军抗战精神，主碑有彭真题词“战绩辉煌永垂史册”，副碑有徐向前、薄一波题词及战役示意图。

纪念馆以图文、实物、沙盘和半景画呈现百团大战三阶段：1940年8月“破袭交通”，重点展示正太铁路破袭战；9月“攻坚据点”，复原狮脑山阻击战等；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反“扫荡”，呈现军民反“扫荡”纪实。馆内两千多件文物中，有范子侠使用的油灯、作战地图、爆破工具，及缴获的日军装备、铁轨残段等，逼真再现那段历史，令人震撼。

在馆内观看《狮脑山战斗》影片。1940年8月20日至26日的这场战斗，是百团大战中持续最长、伤亡最重的阻击战，毙伤日军400余人，牵制其主力六昼夜，保障正太铁路45公里破袭任务完成，迫使日军从冀中调三个大团回防，沉重打击了日寇气焰，展现八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作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百团大战硝烟虽散，烈士英灵永存！

站在狮脑山顶，“中共创建第一城”阳泉全貌尽收眼底：远山苍苍，绿植环抱，楼群鳞次栉比，矿道隐约可见。

阳泉，这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烽火牺盟歌

梁志宏

狼烟惊飞秋雁
烽火映红晋阳。
牺牲救国结同盟
铸就抗日铁壁铜墙。

男儿挺起脊梁
女儿卸下红妆。
牺牲救国结同盟
军民奋勇怒射天狼。

且把儿女情长
化作热血飞扬；
只为神州，自由花儿早日开放。

且把国恨民仇
化作风雷铿锵；
让我中华，驱散乌云洒遍阳光。



阅兵主题文化衫包装袋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系列纪念活动的十项安排将依次展开，其中重头戏是天安门广场的九三阅兵。作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后的首次阅兵，它将扬我军威、国威。

我有一件珍贵的物品——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天安门大阅兵的阅兵主题文化衫。这件“稀世珍宝”，我会永远保存。

这件文化衫为白色，采用100%精梳高支丝光棉面料制成。左胸前印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左半袖缀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塑料包装袋内附有“洗涤保养说明”，配套的手提硬纸袋两面图案相同：左上方是纪念活动标识，正中红线上方横写“阅兵主题文化衫”，下方居中横排两行字分别为“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指挥保障组监制”“河北启发纺织集团公司承制”，纸袋两侧均为红色。

这件文化衫承载着纪念抗战胜利的诸多“唯一”。文化衫和手提袋上的纪念活动标识，由数字“70”、时间戳记“1945-2015”、V形长城图案及和平鸽形象构成，其专属规定使其成为历史的唯一。2015年天安门九三阅兵日，300多名抗战老兵(包括抗战老兵、支前模范代表及英烈子女代表)组成的方队作为第一方阵乘车受阅，其中还包括国民党老兵；而今年的大阅兵，综合考虑老战士身体状况等因素，不再组织老兵方队乘车受阅，而是安排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民兵、地方支前模范代表及抗战烈士遗属代表到天安门现场观礼。因此，我珍藏的这件印有“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指挥保障组监制”的文化衫手提袋成了绝版，“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指挥保障组”也不复存在，这又是一份历史的唯一。

这件文化衫对我意义非凡，它是抗日英烈王凤山将军的孙女王晓莹、孙女婿史志飞小两口于2015年9月5日上午登门看望时赠送的。这年9月3日，王凤山将军的三儿子王述志作为山西省唯一的英烈子女家属代表参加了阅兵仪式，史志飞作为岳父的陪护亲人一同赴京。当日，当抗日英烈子女代表乘车经过天安门时，亲友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王述志，激动地截屏互传，这一喜讯很快传到了王述志居住在台湾的大哥王承志、杭州的二哥王继志家中……当晚，史志飞特意从北京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刘叔，我要送您一件最珍贵的礼品，就是这次活动领到的阅兵主题文化衫。我知道您的身高，特意申请了大号的。”两小口心怀感恩，回太原后第二天，刚陪同王述志接受完《太原晚报》的独家采访，就急匆匆赶来见我。

当年的抗战老兵方队(包括抗日英烈子女)共300多人，这类由“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指挥保障组监制”、由陪同人员申请领取的文化衫，在全国数量极少。而王述志是山西省唯一乘车受阅的英烈子女家属代表，史志飞是其唯一的亲属陪护者，因此这件文化衫在山西、在太原更是罕见。史志飞称它是“最珍贵的礼品”，我深知这是无价之宝。

王凤山(1906至1942)，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代军长。1942年6月17日拂晓，千余名日军及六七辆坦克将45师师部及第2团包围在万泉县(今万荣县)西张瓮村。王凤山率军坚守阵地，与敌人殊死搏斗。午后，敌人又增兵2000余人，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沉着指挥，坚不言退，亲率预备队冲上前线与敌近战。战斗中，王凤山臂部受伤仍坚持指挥，后腹部连中数弹，肠流腹外，他忍痛抱腹，不下火线，最终以身殉国，年仅36岁。为表彰其功绩，国民政府追晋他为陆军中将。后来，他的事迹被改编为话剧《盘肠英雄王凤山》，在战区广为公演，鼓舞了抗战军民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令人深为感动的，是王凤山将军的大儿子、二儿子分别以出生地平阳、平陆命名，三儿子起名“平定”，寄托希望社会安定、国民安居乐业之意。在将军为国捐躯后，他们毅然更名为“承志”“继志”“述志”，以此承继父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遗愿，彰显出实现国家富强的殷殷民族魂，可昭日月。1986年，民政部颁发证书，确认王凤山将军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将军英名荣列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86年，我曾协助王述志办理王凤山将军确认为革命烈士的相关事宜。当年5月，我陪同时任太原市南城区区长刘祥正，登门将王凤山将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送达烈士遗孀王凤英和三儿子王述志。我与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记者站站长翟生祥合写的相关报道，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我撰写的《原国民党将领王凤山被迫认为革命烈士》一文被中国新闻社采用。此外，我的拙作《王凤山将军生前身后》先后见于省内的各大媒体……2019年1月22日，全国各大主流媒体“为了民族的复兴·英雄烈士谱”栏目中，收录了“新华社记者梁晓飞 新华社太原1月21日电”的《王凤山：盘肠奋战的抗日将军》一文。

2015年九三阅兵前，我曾前往将军为国捐躯的战地缅怀先烈。

抗日英烈浴血奋战的壮志豪情、抵御外侮的顽强斗志、牺牲奉献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敬仰。而那件阅兵主题文化衫，我也将永远珍藏。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珍爷爷

唐中才

早前的一天，我路过小北门，恰好接到山西省信林公益基金会的邀请，去参加他们主办、地点却在我家乡的一场抗战纪念活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珍爷爷。

我家在山区，出了街门就到了别人家的房顶。这户人家有些特别：老太太我们叫珍奶奶，老爷子却叫贵成爷。他们的孩子，有的姓武，有的姓李，不像我们这儿的家庭，孩子们都随一个姓，男女主人的称谓也多是顺着男方来，比如男主人叫祥大爷，女主人就叫祥大娘。小时候我满的好奇，便问长辈缘由。长辈说，珍爷爷以前是村长，被日本人杀害了，贵成爷爷是后来入赘的。那时一听“日本人”，我心里又恨又怕。

珍爷爷的女儿如今住在小北门，我叫她姑姑。我向她征集村里往事时，她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我们那儿以前有条铁路，日本人通过铁路、公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妄图扼杀抗日力量。当时我们村处于敌我拉锯地带，日伪政府需要一个“维持村长”为他们办事，而八路军也需要一个“合法”身份的人做地下村长，为根据地传递消息。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落在了珍爷爷身上。

珍爷爷是投亲靠友来到村里的外来户，他家住在铁路沿线，还有不少亲戚住在敌占区，这让他穿越铁路封锁线、收集敌占区情报时，有了诸多便利。当地下党找到他时，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了伪村长的身负。

百团大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那儿也参与了扒火车、搞破袭的行动。夜里，八路军带着民兵扒火车抢布匹、子弹，或是直接把铁轨扒了，用接力的方式送到后方根据地，来不及转移的物资就藏在我们村里。日本人多次“扫荡”，却次次扑空。日本人转头对敌占区实行白色恐怖，接连搞起所谓的“治安运动”：先办“良民证”，甄别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中的反日伪人员；接着封锁物资，限制粮食、食盐供应；后来又搞文化洗脑。即便如此，珍爷爷仍偷偷给不少地下抗日人员办了“良民证”，输送了大量情报和物资。

珍爷爷的牺牲，和邻居的女婿有关。这个女婿曾是抗日干部，在村里及周边发展了很多地下抗日力量，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经不住诱惑，叛变了。那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村子，珍爷爷还像往常一样，为日本人鸣锣召集村民集合开会。可村民一聚起来，日本人就按着名单抓人，珍爷爷就在名单上。之后，他被杀害了。根据叛徒出卖的线索，日本人展开了大规模抓捕。抗战时期，珍爷爷家共有7人遇害。

如今，姑姑已年近九旬，说起这些往事总会一声叹息。珍爷爷牺牲后，珍奶奶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手里牵着四五岁的女儿，逃到太原投亲靠友。那时的太原的桥头街一带满是流民，珍奶奶靠缝补衣服挣点零钱，捡些菜叶勉强维持生计。

父亲在回忆录里说，我们村在抗战中牺牲了十几人。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再次路过小北门，我又想起了珍爷爷的故事。写下这些，是为了缅怀那些为抗日牺牲的无名英雄。